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56
26 January 1978

CHINESE

第二〇五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四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加尔巴先生	(尼日利亚)
<u>理事国</u> ：玻利维亚	富恩特斯·伊瓦涅斯先生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陈楚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胡林斯基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加蓬	恩东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韦希马尔先生
印度	贾帕尔先生
科威特	比沙拉先生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麦克亨利先生
委内瑞拉	洛佩斯女士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A-3550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八年二月一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四十五分开会

主席致开会词

主席：尼日利亚于一九七八年初开始其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任期。同时，它担任了联合国这一重要机关的主席职务。因此，我们既身受光荣又挑起了重担。我们答应全心全意负起这个责任。

当我主持安理会一九七八年这第一次会议之时，我高兴地欢迎其他几个新理事国：玻利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加蓬和科威特。我肯定，当我称许安理会刚卸任的五个理事国：贝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罗马尼亚的代表，赞扬他们在任期内对安理会维持国际和平及争取国际正义的努力所作的贡献时，我是表达安理会所有理事国的心意。

我谨代表安理会各理事国向毛里求斯外交部长哈罗德·沃尔特爵士以及毛里求斯常驻代表兰普尔先生表示衷心感谢。他们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期间令人非常钦佩地领导了安理会的工作。

现在，我希望安理会容许我以尼日利亚安全理事会代表的身分说几句话，作为我的初次发言。

我们参加安理会，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绵薄贡献可以进一步推动国际性行动，为人类在南部非洲所面对的问题寻求一个建设性的实际解决办法。安全理事会既对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负有特别责任，今年就应该采取有效行动，因为若再迟不采取有效行动，就等于错过了开向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定的最后一班火车。尼日利亚和非洲对这点非常关切。

当安理会在新的年里着手处理它的工作方案的时候，我相信各理事国在这庄严的机构内进行协商，定会继续牢记，时时刻刻认清并正确对待自然正义、平等、自由和人类尊严等道德原则，最为重要。因为这些道德原则实是当初创立这个伟大组织的精神原动力，希望由它为人类空前的自相残杀之后仅仅幸免完全毁坏的世界带来并保证国际和平及安全。

我不得不提请注意旧金山会议的精神，我希望安理会各理事国，尤其是那些无疑对南部非洲正在发展的事情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西方国家，能够甚至在这最后时刻履行他们对国际社会所承担的义务，使这个地区目前的危险局势不至发展成种族战争。他们这种义务是与他们在这机构里一贯享有的特殊地位形影相随的。

请安理会各位成员容许我简要地叙述一下，过去几个星期这个地区所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继续加深我们的恐惧，因为索尔兹伯里的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和它在比勒陀利亚的疯狂师傅，在推行他们令人不可思议的不人道政策时，是无意听取理智的声音的。在这些政策之下，他们表现了赤裸裸的野蛮行为，对非洲人多数进行肆无忌惮的压迫，又再三以可恶的“穷追”主义为理由，向邻近独立的非洲主权国家进行罪恶的武装入侵。

理事国应记得十一月二十三日那天，罗得西亚联合作战部长安东尼·帕克说正在调查罗得西亚陆军的暴行，可是就在那一天，罗得西亚陆军正从事它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行动，使一千二百人（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在莫桑比克的难民营中丧失了生命。这些在六日后才发表的袭击，参加的有从西方军火库供应给叛乱分子的海军直升机战斗轰炸机和直升机运载的部队及步兵。部队进入莫桑比克的路线在几个星期之前已先由罗得西亚突击队作好了准备。

我们尼日利亚人一直相信用和平办法来解决争端。在那个基础上，我们真诚地考虑英美两国所提出关于罗得西亚的建议，作为谈判的基础，尽管这些建议有些地方是非常不完善的。不论何时，几乎在联合国这儿召开的所有会议上，以及在同谈判解决的倡议者私下磋商时，我们都一直探询如何替换史密斯。我们的探询没有得到答复，充其量只是引起模棱两可的回答。当史密斯宣布他正在寻求“可能更佳的办法”来保证白人的信心时，英美两国提出的主动突然变得少气无力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恐惧被证实了。

对于索尔兹伯里上演的这幕丑剧可以作出的最合逻辑的推论是这几个月来对莫桑比克所进行的那种例行公事式的军事侵略行动，目的是要削弱解放力量抵抗内部

解决办法的能力。英美两国主动的拖延，不能不看作一个战术上的动作，目的是使史密斯可以炮制出一个所谓内部解决办法，让国际社会和安理会只好接受一个既成事实。

正当安德鲁·杨大使同联合王国外交大臣戴维·欧文准备和爱国阵线的领导人乔舒亚·恩科莫和罗伯特·穆加贝在马耳他会面，商谈罗得西亚战争停火的方法时，昨天报导的一个消息来得一点也不意外。这消息大致上说，那个叛乱分子头目可能会宣布他已经同某些在罗得西亚的非洲人领袖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这个月整个月来，马耳他会议被用作为阻止安理会行动的借口。这个战略实在不难理解。西方国家一直没有改变它们在罗得西亚以至整个南部非洲的目的；所不同的只是他们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和维护同样的利益而改变了战略而已。

可是，我想在这儿提出警告：任何不符合津巴布韦人民真正愿望的解决办法都是没有机会生根的。如要防止罗得西亚进一步陷入一个只会加深人民困难和痛苦的血腥种族战争，安全理事会就一定要超越局部利益，迅速坚定地行动起来。在这样的战争里，非洲人民的处境可能不会比他们现在的情况更惨。我诚恳希望，那些支持和唆使史密斯公然抗拒国际社会的人，现在停下来反省一下他们过去的行为，悬崖勒马，以免使整个领土到处蒙受祸患和破坏。

纳米比亚的形势没有任何差别。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用各式各样毫不相干的事情来阻挡安理会的五个理事国现在进行的谈判的进展。种族主义者采用的谈判作风和战略，一贯都是为了维持他们对该领土的非法压制，对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种决议，视若无睹。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都承认是真正代表纳米比亚人民的声音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只要求贯彻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但南非一直推诿，拒不执行，正如它一向傲慢地拒绝执行联合国其他决议一样。

种族主义者假装已经结束了那个臭名昭著的图尔恩哈勒会议。这个会议本来是要把一个难以实施的宪法卡在纳米比亚人民的脖子上，有效地以种族界线来两极分化政治控制。根据这个宪法的规定，议会只能在各部族“协商一致”的情形下才能

采取行动。这样的宪法，使人想起那个“自由否决权”，那个在十七、十八世纪拖垮了波兰政府的所谓无异议条例。这样的话，纳米比亚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很难作为一个国家有所作为。国家事实上只会是一个部族联盟，根本没有机会改变那些保障少数白人统治的财产和其他法令。

现在，比勒陀利亚政权打算继续追求那个表面上在图尔恩哈勒会议已经放弃的目标。他们想把这些目标救活，在一个所谓内部解决办法里，走后门把它们带进来。这些种族主义者为了向国际社会兜售这迷人诡计，答允通过自由选举产生一个新的纳米比亚政府，并同意允许联合国派员观察。但第385(1976)号决议的主要条款，包括撤去种族主义者的军队和半军事人员，为自由公平的选举创造适当的政治环境，都仍未得到贯彻执行。无疑地，比勒陀利亚政权是希望借顽抗的政策，厚颜无耻的拒绝为和平投票创造适当的条件，企图把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及联合国都排除在选举之外。

在此情况之下，国际社会将见到以西南非民组拒绝的部族宪法为前提的一次选举，没有任何有真正民族基础的政治人物参加。即使在目前，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仍十分忧虑南非同意给予政治自由的承诺是否可靠。去年十二月，所有该党的领导人都突然被捕；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集会被种族主义者雇用的恶棍和打手捣乱解散。一年前，沃斯特先生用声东击西的手法来蒙骗国际社会，假装为了减轻国际间对南非的压力，他已决定放弃纳米比亚。现在可以清楚见到，他是决心在这问题上公然反抗全世界，正如在他的种族主义镇压政策上一样。我们要找这种臭名昭著的顽抗例子，实在毫不费力。就在去年第三十二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前，沃斯特公然违反一切法律规范和道德准则，宣布吞并纳米比亚的沃尔维斯湾，充分表露了他的恶毒意图和他向全世界的挑战。

即使在纳米比亚独立后，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也一定会尽一切力量在纳米比亚维持一种有损于大部分非洲人民的局面，使种族主义者和经济上与之勾结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永远不择手段地开发属于非洲人民生来就有的权利的丰实而

并非永远取之不尽的资沉。因此，理事国的行动应从上述观点出发。

在南非本部，种族主义政权在最近一次选举中获胜。但这个只有白人投票的选举是无意义的。由于胜利冲昏头脑，它看来已经立下决心，利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来维持那令人厌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我无须重提沃斯特和他那个执政的国民党党员们在去年竞选期间所用的丑恶说词和他们发表的煽动性言论。选举之前，沃斯特呼吁白人让他大获全胜，借以抵制干予南非内部事务的政策。于是有一部分国际新闻界便试图放出烟幕，暗示那是沃斯特的竞选策略，只是为了使他之后能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对种族隔离制度进行必要的改良。

倘若我们对种族主义者的真正意图尚有多少怀疑的话，一系列再次发生的镇压、放逐、随意拘禁、非法审判、无数的酷刑和绞杀案件，以及暗中消灭种族隔离的白人反对者（如三十六岁的纳塔尔大学政治学教授理查德·特纳先生），也会立即把这些怀疑消除了。

调查史蒂夫·比科死因的那幕丑剧，就是其中一例，让那些支持种族主义者最力的人也终于认识到这国家现时是真正的走在邪道上。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他们任意公然隐瞒和歪曲证据，对国际社会可能给予道德上的谴责毫不顾忌。尽管比科家属的律师西德尼·肯特里奇先生申明，倘若判决为采用恐怖手段的保安警察开脱罪行，说他们并没有合谋或甚至由于疏忽而造成比科的死亡，那就等于可以任意凌辱或残害无抵抗的人而不受处罚；尽管比科的残酷监狱看守有罪的证据确凿，案重如山，法官的判决竟然说比科之死不能归咎任何人。而且似乎为了加重这项判决给比科家属和一般非洲人民带来的痛苦，比科的兄弟卡亚和表兄弟所罗门又罪状不明的被逮捕，而且被粗暴地送进比科被害的同一牢房中。

这个判决，对我们这些一直注视南非演出的这幕永无休止的恐怖剧的观众来说，难以说是出乎意料。那个法官是个公务员，基本上向司法部长詹姆斯·库鲁格负责。较早时，库鲁格曾对一个震惊的世界说，他对比科死在狱中的事情无动于衷，那个法官从这句冷酷无情的说话中得到暗示，仅用三分钟时间便宣判了一个花了超过十五天来调查审讯的案子。这件卑鄙的事件后，又有四十八个手无寸铁的非洲

爱国者被沃斯特的保安警察蓄意杀害。比科和许多其他案件的判决证明了一点：南非卑劣的政治秩序不会自取灭亡地在非洲人民面前自动把罪归咎于自己。正因为这个原因，这国家正处于重重包围之中。

种族主义者公然违反大会的决议，坚持把南非巴尔干化；它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六日同意让博普塔茨瓦纳的班图斯坦宣告所谓独立，就是其中一例。各理事国无疑地都知道，班图斯坦的设立是一个计划周详的阴谋；实际上它是种族隔离制度的另一凶恶面，企图在面积占这国家的百分之八十七，而出产占国内总产值的百分之九十七的地方永远维持白人的统治。在这恶毒阴谋之下，种族主义者把百分之十三的土地分为不经济而且不连接的保留地区，把非洲人赶进去，隔离成一个个“缓冲国”；当自由战鼓隆隆之声从林波波河一直响到好望角时，又把他们用作“炮灰”。

安理会第417(1977)号和第418(1977)号决议，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南非的反应。头一项决议谴责南非的镇压暴行；后一项对种族主义者施加武器禁运。但这些决议却似乎起了反作用，因为就总的效果来说，这些决议使种族主义者加强他们镇压的政策，使他们为了达到武器生产自给而改组国内工业。

现在问题是：安全理事会可以采取什么步骤？由于南非政府的暴行这个问题过去几年已在安理会不断的提出过。南非政权对住在那个悲惨国度里的大部分非洲人民任意摧残杀害，如今既已成为例行公事，所以我们已经过了那个仅仅表示深切关注的阶段。现时当地的情况，比去年十一月的情况还要坏。而那时，安理会一误再误，才根据宪章第七章对种族隔离政权采取了第一步。大家都一致认为，种族主义者为了使国内的军事工业达到自给的地步，一定需要信用、银行贷款和新的投资。为表示诚意，南非的西方支持者可以马上采取措施阻止新资金的注入，不然的话，这只会使安理会通过第418(1977)号决议的崇高目标受到挫败而变为无效。不仅如此，我国代表团认为，象索尔兹伯里和比勒陀利亚那样跳梁小丑的政权，反已变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倘若西方断绝与索尔兹伯里非法政权的关系，同南非交往时坚定地站在自然正

义、平等和自由的一方，遵奉历代始终明确拥护的西方理想，西方的利益就仍能得到保全。安理会的西方成员有力量，即使不为别的，为了加强安理会的信誉和黑非洲对安理会作为人类对国际和平及安全的真实保证的信心，迫使南非执行关于纳米比亚的第385(1976)号决议。

一九七八年是决定性的一年，构成本安理会至今面对的最大挑战。尼日利亚和其余的非洲国家指望得到它的支持以阻止自相残杀的种族战争在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两地爆发。这样的战争只会给该地区的所有人民带来灾难和悲剧。妄图保护某些集团利益而公然不理睬这一地区各族人民争取真正独立的真诚愿望的内部解决办法，是注定要失败的。内部解决办法的拥护者期望向安理会摆出既成事实；但实际上安理会手中拿着的可能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炸弹，一旦爆炸起来，很可能在整个地区造成极大的浩劫。本安理会有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的永久责任。我希望安理会不会辜负国际对它的期望，也不会辜负非洲在我们共同关怀的问题上的合法愿望。我国代表团希望各理事国踊跃提出进步的意见，能够有效地阻止整个南部非洲地区陷入种族对抗，以加强人类对理事会履行联合国宪章所载目的和宗旨的信心。

最后，我想把尼日利亚对秘书长的努力表示感激的心意载入记录。秘书长在他最近的旅行中，曾为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正义事业注入新的力量。我希望本安理会的理事国通力合作，加强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因为只要地区性冲突继续恶化，大国对抗的阴影不断出现，我们就根本谈不上确立和保证国际和平及安全。

现在我继续执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务。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 (a)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加蓬、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538)
- (b) 秘书长的说明 (S/12536)

主席：安理会的理事国收到了第 S/12539 号文件，其中载有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加蓬、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代表一封信，全文如下：

“我们在下面签名的安全理事会理事国谨要求安全理事会在专门审议“南非问题”的会议上，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南非《东伦敦每日快报》前编辑唐纳德·伍兹先生发出邀请。”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伍兹先生发出邀请。就这样决定。

我想通知安理会各理事国，我也收到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加蓬、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代表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我们在下面签名的安全理事会理事国谨要求安全理事会在专门审议“南非问题”的会议上，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约翰尼·马卡蒂尼先生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观察员代表戴维·西贝科先生发出邀请。”

这封信将作为安理会第 S/12543 号文件分发。如果没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马卡蒂尼先生和西贝科先生发出邀请。就这样决定。

在适当的时候，我会请马卡蒂尼先生和西贝科先生发言。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安全理事会今天的会议是应加蓬、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常驻代表在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的信中代表联合国的非洲国家集团提出的请求而召开的。安理会的各理事国收到了第 S/12536 号文件，其中载有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九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给秘书长的信。

第一位发言人唐纳德·伍兹先生，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他发出了邀请。我欢迎他，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向安理会发言。

伍兹先生：主席先生，你和安理会的其他成员也许会有兴趣知道，虽然从十月十九日以来，我国的所有报级、无线电和电视都不准引用我说的或写的任何话，我听说比勒陀利亚政府给了它们特别的许可，让它们引用我今天在这里说的话。无疑的，这个决定后面的用意是向南非的白人宣扬我是南非白种人的叛徒。但是，不论它的动机如何，我个人乐意见到南非人民，包括白人在内，有机会知道我在这个论坛的发言。

我是以几种身分发言的。首先，我是以一个非洲人、一个世代代是非洲人的后裔以及一个以生为非洲的儿子为荣而且誓为非洲奋斗的人的身分向安理会发言。

当我作为一个非洲白人必须同我的家人逃离我们的国家去继续向种族隔离进行斗争时，帮忙指引我越过边界取得自由的是黑人；在莱索托、博茨瓦纳和赞比亚向我伸出欢迎之手的是黑人；黑人统治国家里的黑人领导人派遣黑人警卫员来保护我白色皮肤的孩子。我们在非洲停留的最后一晚，我和我的妻子和小孩荣幸地与非洲大陆的伟人之一，肯尼思·卡翁达总统一同晚餐。

现在又临到我非洲大陆的一个平民所能渴望得到的最大荣誉——特别荣幸地在出席这个世界论坛的最具影响力的几个非洲国家的赞助下被邀向安理会发言。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感到特别骄傲能以一个非洲人的身分向安理会发言的原因。

但我也以另一种身分发言——作为地球上被夺去了生来就有的领土权利的千万人中的一个。我们的名称很多。有人叫我们难民；有人说我们是被放逐的人；

有人称我们是失所的人。仇恨与暴政迫使我们背井离乡；我们在国外到处流浪，寻找兄弟般的情谊和正义。

我们之中多数已经找到了那兄弟般的情谊，标志着人类已有的进步的程度；而我们仍不能放弃对正义的追求却又标志着人类还需争取的进展。

这些结论得出的事实表明了我向安理会发言的第三种身分——作为人类大家庭的一员。有人常喜大谈特谈我们人类都可能具有的卑劣品格——自私自利、愤世嫉俗、背信弃义和残酷无情。但是，在我的一生中，我见到那么多人都可能具有的高贵品格，我必须在此，在理事会这个全人类的内阁之前，向我见到人类精神所达到的崇高境界致敬。

在我自己的国家里，我曾目睹无数舍己为人、英勇高贵的事迹；报道出来一定会感人肺腑。这些事迹都是对付困难环境能力的高度表现，而这种能力是每个人都可能具有的。

人类的高贵精神并不只存在于任何一个民族，由于这种精神是人类的爱心的最高表现，而人类的爱心最普遍地表现在大多数人日常的友善性情中——这种性情是我在过去二十年荣幸地访问过三十三个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都注意到的——我不得不相信人类的兄弟关系不是达不到的神话，而是可以实现的事情，只要我们这些世界公民以我们最大的热情去追求，就可达到。

今天我们的技术已经打破仅是一代以前还稳固地存在的人类信心的壁垒。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的祖父们中有多少位不认为太空旅行是不能达到的神话？但是对我们的孩子来说，这个观念就连希奇也不再是了。

难道我们真的怀疑人类精神的无限能力能远超我们在技术上的成就，远超这些仅仅是物质上的目标？

我们不能这样怀疑下去。我们不能屈服于这种愤世嫉俗的态度。不然，我们就让联合国解散，让所有人都对人类的前途感到绝望吧！

但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我们必须接受我们作为世界公民和人类大家庭成员所面临的挑战，去呼唤各国人民相互亲善，对那些较崇高的念头作出新的反应，莫让那些念头往往由于日常生活上物质的追逐而被完全忘记。

这项挑战是指一种态度和这种态度的实际表现。这就是说，不仅是人类的兄弟关系的目标必须时刻高举，而且他们所选出的领导人也应该不断制定可供他们检查、讨论和遵行来更快地实行这项目标的实际方案。

我认为，全世界绝大多数的人都愿意服从这样的领导，只要让他们能经常知道问题所在和事实，有机会参加决策过程；我也相信，人类能利用来达成这项兄弟关系的目标的最大力量就是道德力量。

但是要想有效利用道德力量的号召不落空，就必须先驳斥认为道德力量在国际事务中毫无效力的论调。

去驳斥这个论调不难。事实上，这个争论已经被历史本身驳倒。我们必须感谢一个非洲——事实上是南非的伟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利用道德力量的好例证。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确是具有南非的背景和经验。我指的是独一无二的莫亨达斯·克拉克姆琴德·甘地。

这位南非纳塔尔的律师，中年时才离开南非，后来成为现代印度之父和全人类的一个英雄。他具有运用可畏的政治力量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他在同另一位南非的天才和联合国的创始人之一简·斯马茨的冲突中逐渐形成的。这种政治力量就是消极抵抗。

圣雄甘地不用发一枪，不用调一卒就把成千上万的人民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这就是大量利用一致的理想而产生道德力量的最好例证。

现在我要建议以道德力量来达成本组织早已制定的一个目标——把我国人民从称作种族隔离的法定种族主义政策下解放出来。

在这方面，我要求联合国以新的办法来对付种族隔离，并要求大家对我国人民

在这个问题上所面临的复杂困难有新的了解。

我要在此为南非辩护，我这么说的意思是我要在此表明南非问题的真象。

真正的南非是一个总共有2,500万人口的国家，种族隔离的受害人是所有的2,500万人。虽然种族隔离的枷锁以全世界都知晓而且谴责的方式最沉重地落在我的黑人同胞的身上，我也同样地关心我的白人同胞，因为他们今天受到这个政策的精神奴役，明天就要不幸地承受这种奴役的严重后果。

必须承认的是，种族歧视存在于世界的许多角落，但是种族隔离对人类造成了奇耻大辱是因为只有在南非，种族主义通过实际的成文法成为一种制度。

我无须在此详述种族隔离的罪恶。这些罪恶都是众所周知、举世嫌恶的。但是，我对种族隔离还是要再说几句话，就是整个问题不仅对南非人民而且对较广泛的国际关系都已到达十分紧急的地步了。

本组织已经在原则上一致认为，种族隔离对国际关系构成威胁，因此，也威胁到世界和平，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它在我的国家所造成的严重影响。

我关心的是，如何在尽可能最大的范围内保持和平，尽可能在南非境内挽救生命，黑人青年和白人青年都一样，因为他们都能而且将来都必须成为同一个国家的同胞兄弟。

因此，我要求联合国以积极、建设性的、非暴力的行动来对付种族隔离。

当我恳求大家为达此目的采取新的办法时，我是恳求过去由于这个问题而产生的各派系能作出一个新的综合反应。

当前的急务是，各国对这个问题取得目的的实际一致，以便采取一种适度而有效的行动途径，使南非青年方可免于种族内战的惨祸。

这种行动途径是否会被采取，现在就要看西方国家了。

许多年来，西方国家为了各种理由，不肯对南非政府实行有效的惩罚性措施。

但现在，西方国家应该开始重新评价它们过去的态度了。

有效的惩罚性措施不一定也不应该是极端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必须要严厉到足以使比勒陀利亚政权醒悟过来，否则南非人民就难逃一定要来的悲剧。

这些措施是指立刻重新考虑执行经济制裁，那些以会替黑人带来经济苦难为理由反对这种制裁的人应该注意到，南非最具权威的黑人发言人一再指出，他们宁愿忍受这种苦难，也不愿见到种族隔离政策继续推行下去，他们认为这种政策对他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来说都否定了他们的人格。这是远自纳尔逊·曼德拉起，所有的领导人，包括已故的史蒂芬·比科在内，都始终一致，不断表明过的立场。

我个人认为，如果西方国家还是不对这个问题采取较坚定的立场，它们就没有负起道德责任，没有握住第三世界伸出来要求它们承认一项人类的共同义务的手，他们也辜负了面临死亡危险的我国人民——白人和黑人。

人类的家庭渐渐趋向团结，受着国家边界所限的老式沙文主义愈来愈微不足道了。任何国家能在孤立的环境中繁荣起来的神话也被愈来愈多的人视为谬论。事实上，令人惊异的是，这种观念竟存在了那么久，因为历史常常证明边境哨所是人类的天然继承物的观念是没有道理的。

以前有人认为每个部落的成员都是永远受出生和地理的限制，并认为每个种族都有永久规定的领土，现在这种想法已属无稽之谈。

在历史上，这种观念早就证明是错误的，尤其是一些在外国出生的领导人在他们选定的土地上表现了强烈的国家主义，更加显示这种观念的荒谬。拿破仑不是在法国出生；斯大林不是在俄国出生；德·瓦莱拉不是在爱尔兰出生；希特勒不是在德国出生；维尔沃埃尔德不是在南非出生。

今天，大家不再认为非洲白人是“欧洲人”。正如今天有非洲白人，今天也有英国黑人和美国黑人，他们被认作这些国家的成员，而不仅是一个种族的成员。

随着人类的进步，人类大家庭成员的关系也愈加亲密。正如任何一个家庭的

成员为了他自己的好处可能必须受管教，然后才能更加紧密地成为家庭的一员，因此，今天我认为我的国家的统治者必须面对人类大家庭的联合管教，他们才能和平地成为人类的兄弟。

正如我已说过的，能否及时采取行动来防止南非发生大规模的暴乱就得看西方国家了。西方国家能无视世界大家庭其他成员的呼吁吗？

对美国人，我要说：难道这块曾经出过亚伯拉罕·林肯和马丁路德·金的土地这个以前曾经为了人类奴役的问题打过艰苦的内战的国家，真的认为，它对美国宪法的基础，就是人类自由这个中心思想的信奉现在必须限于“从海到闪烁发光的另一海”？

对法国人，我要说：在历史上，你们是首先献身于反对少数人生来有权统治多数人的观念的国家。你们是第一个在宪法中明确表达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的国家。法国不应该是在世界会议中最后一个实践这种思想的国家。

对德国人，我要说：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象你们那么有效地显示人类有能力迅速地从毁灭和举世谴责的深渊里提升到有成就和举世称赞的高峰，人们不再把你们跟一个死去的独裁者的罪恶认同，而再度认为你们的国家就是出过巴赫、歌德、贝多芬、席勒和许多文化巨人的国家，这些人物体现了人类精神能够达到的高峰。你们是产生这些人物的国家人民和这些人物的后代，有特别的义务对种族主义政权采取不妥协的立场。你们过去的经历和你们目前的地位都要求你们应有这样的表现。

对加拿大人，我要说：南非黑人感谢你们带头开始同他们统治者断绝关系。这项行动对我国黑人的士气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他们希望那些目前陷溺较深的其他国家能学习你们的榜样。

对英国人，我要说，你们形成了我所见过的最文明的社会；你们对人类自由的贡献比任何其他过去是帝国的国家的贡献都大，你们在社会中作出的改革之多和所

付的流血代价之少，是没有任何其他古老的¹国家可比的。但是，你们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成就是你们曾经单独击退一个较强大敌人的进攻，如果你们那时候动摇了，让敌人得逞的话，就会造成大多数人都受奴役的命运。你们现在不要单独反对那些想制止别人受到奴役的人吧！

我愿在对西方国家提出呼吁后，再提出对西方社会理想的一项挑战。这项挑战是：如果你们不愿对沃斯特政府施加任何特别压力的原因是由于你们自私自利，那么你们就永远不要再谴责它了，因为沃斯特的动机也是自私自利。但是我一向崇拜西方民主自由的理想，我希望由于南非最近发生的事件，西方国家现在会毫不犹豫地作出积极地反应。

过去几个月内南非当局的行径使我们很清楚地看出它的动向。南非政权杀害了我的挚友史蒂夫·比科，所以它要对依据安全法不经审讯、控诉或甚至毫无罪名而监禁的第四十五名受害黑人的死亡负责。这件暴行令人更加忿恨，因为史蒂夫·比科是我们人民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而在这件令人忿恨的暴行发生以后不久，南非政权就采取行动来镇压对种族隔离作有力批评的最后一个领域——新闻界。

我另一位好友《世界报》的编辑珀西·科博扎，是未经审讯而被拘留的，他此刻仍被拘留，政府在十月十九日封闭了他的报纸。我是同一天受到禁制的，我的一位记者坦吉韦·姆廷佐早已受到禁制，她不知道因为干了什么事而一直被拘留。还有许多人，多数是黑人会议组织的领导人，例如这个组织的主席哈库·拉齐迪也在十月十九日被拘留，同一天还有我另外几个朋友，拜尔斯·诺德牧师、西奥·科兹牧师、塞德里克·梅森、布赖恩·布朗、彼得·兰德尔、戴维·拉塞尔牧师等都遭受禁制，他们都是致力于种族和解和全国和平的。到今天为止被拘留的另一些朋友是：马卢西·姆普姆尔瓦纳、诺尔·莫哈皮、塔米·扎尼、姆索利西·姆沃沃。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行径清楚地说明它不再容忍十月十九日以前还稍微可以公开进行的有力批评了。

在新闻报道方面仍然允许某种程度的批评，但唯一的条件是这并不是有力的批评而且并不使南非政权十分为难。

随着班图斯坦政策的进一步推行，种族隔离的执行显然将会强化，而南非政权企图以班图斯坦政策在黑人部落集团间制造领土上的分裂。如果在公开讨论班图斯坦问题以后让南非黑人有机会投票表态，那么大多数黑人会普遍反对这项政策。

一九七四年十月南非发言人罗埃洛弗·博撒曾经向本组织保证南非要排除种族歧视，这是个弥天大谎。他在玩弄文字，因为他脑中所想的班图斯坦化的“本土”政策就是要混淆视听，使人以为南非各部落集团会获得所谓的国家地位，于是种族隔离的歧视就基于所谓的国家而不是基于种族。

他这种搬弄文字的说法就是要假定有一天所有南非黑人都成为“外国”班图斯坦的公民，于是他们就不能要求同所谓白种南非人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了。这样一来，博撒大使就能在这儿向大会宣称说他们不再歧视黑人公民了，这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黑人公民了。

我可以告诉你们，博撒先生最近在全白人的选举中，也就是在几乎不足百分之十的人民选举全国政府时，在国内说了一些极其蔑视世界舆论的话，而这位博撒先生却在一九七四年在此地作过一次哄动的演说，热情地逢迎世界舆论，前后两次演说，形成一个对照。

当初，我是听他的话而上当的一个人。我也是欢迎他的发言并赞同沃斯特在演讲中提到“给我们六个月”的话的一个人，而且还动笔欢迎这些发言，认为这些发言就其字面意义来说是值得相信的，我并且说应该给沃斯特先生的政府一个机会来实现这些承诺。

可是，今天我们却知道这是一场空梦，这是由于曲解文字而造成的。

我离家不到一个月，在离家的前一星期，武装警察把一对年青夫妇和他们的小孩赶出限于白人游泳的海滩，理由是他们的肤色太黑了。这是在十二月底发生的事。即使在社会上的种族隔离范围内，一九七四年博撒大使哄动一时的承诺只是如此而已，假如博撒大使原先有诚意，这是首先应该废除的一项种族隔离。

我必需告诉大家，目前我国黑人的忿恨很深，而多数白种选民抵制公平妥协的决心又十分顽强——最近全白人的选举证明了这一点，以至于双方势必由互相冲突而走向种族内战。要是世界社会不联合采取行动的话，这种悲剧是很可能发生的。

我代表我国内外成千上万不能发言的人民要求世界社会尽早加强一项排斥比勒陀利亚政策的政策。首先必需由西方各国合作，效法非洲各国尤其是北欧各国及荷兰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所做出的榜样。我认为西方各国的第一优先事项应是立即采取解除政策，也就是解除在外交、文化、运动、贸易、军事、投资、一般性经

济等方面与该政权的现有联系。

西方有一些工业家和投资者辩护说，他们的钱有利于南非黑人，他们反对解除政策的理由是，没有这笔钱，世界上这部分黑人的经济福利就会受到损害，我对他们这些人的答复是，把你们的钱投资到能产生更良好的结果而且实际上有助于同样的受惠人的其他地方吧。把你们的钱投资到莱索托、博茨瓦纳和斯威士兰吧。把你们这一大笔做慈善事业的钱投资到这些穷困的领土去吧，因为目前那里的失业人民不得不到种族隔离的领土上去谋生。

有些人争辩说，进一步施加压力只会把南非白人逼入一个自我围困的营地内，我的答复是：他们已经在这个营地了。国家控制的电视、无线电、南非荷兰语报纸就是要保证做到这一点。沃斯特最近在选举宣传中就用“随便你们怎样干都是活该”这句话向全世界挑战来争取许多选票。我认为我们应该接受他的挑战。

可是，我要重申，我们不应该动气，也不应该用暴力来对付这项挑战。我认为世界各国也应当考虑对种族隔离的支持者运用一套心理上的压力。其中包括拒绝把签证发给知名的种族隔离支持者，或至少不把签证发给拒绝签署声明反对种族隔离的人。这种措施会获得很大的道德力量的支持。

沃斯特先生在他的政党集会上用扩音器破口大嚷，他和他的拥护者并不在乎世界舆论，如果我们相信他这种辞令，那就错了。其实，他们十分在乎，但世界舆论何以到目前为止还没能够影响沃斯特使他改变政策，其唯一原因是世界舆论的主要影响力到目前为止都是口头的。

三十年来，历任的南非政府都在联合国内受到谴责，但是西方国家的否决票都挽救了它，使它没有受到有作用的压力。结果，今天南非把联合国的指责当做笑话看。它成为搞政治的人和喜剧演员的笑柄，而多年来保护比勒陀利亚的西方国家集团也成为他们的笑柄。我认为现在该是结束这个笑话的时候了。我的许多同胞因它而受苦，而且死在自认为不受世界谴责的影响的治安警察手下的人太多了。

对付沃斯特政府的国际压力应该有一个积极、实际、具体的目标，而这个目标不应该损害到我国的财产和人民，而要为了人民自己的利益来唤醒他们。这个积极、实际、具体的目标就是要使他们同大多数黑人的真正代表坐上谈判桌。我们应该迫使沃斯特政府召开一个真正的全国会议，让各社团所选出的领导人参加。这样一来，假如我们要求的目标只限于使他们同他们大多数同胞坐上谈判桌，那么南非政权就不能说世界各国企图为南非人民制定国内的政策。这就需要人民选出大多数黑人的真正代言人，这又需要释放纳尔逊·曼德拉、罗伯特·苏布克韦、所有在罗本岛上的政治犯、全国的一切政治犯、所有被扣押的人、所有受到禁制的人，还有不论是受到禁制或地下的，在国内的或流亡在国外的所有政治运动的合法发言人。如果南非政权说他们是普通的罪犯而不是政治犯，那么就让他们根据通常法律公开对他们起诉吧。

假使国际集体行动根据这种道德力量，用这种实际行动来对付沃斯特政府使它坐上谈判桌，那么我国大多数同胞就会终于在这块不幸的土地上看到自由的曙光。

自从一九四八年种族隔离首次立法以来，有一整个世代的南非黑人生来饱受其苦，还有极多人死于这个制度暴力之下。发动这项能够和平地终止南非镇压的唯一切实办法的时候已经到了，而最适宜于采取主动来实行这项办法的国家就是西方民主国家，因为它们的宪法最强调个人自由的原则。

鉴于联合国宣布种族隔离是危害人类的罪行，最后我要呼吁安全理事会考虑把在这方面犯了滔天大罪的已知罪犯进行登记。要使这项谴责具有充分国际道德影响力并要避免这种措施变成专为谋求政治报复的方法，我建议依照下列指导原则以正确的法律办法进行最严格的程序控制：第一、不再把危害人类的罪行视为专属于犯罪地点国家政府所关切的国内问题；第二、各国政府谴责这种罪行而采取行动时，应把全人类的普遍利益放在各国人民特殊的民族利益之上；第三、惩罚这种罪行的措施应该是针对主要有关的罪犯而不应该针对他们所控制的人民团体；第四、这些

惩罚措施应是道德力量而不是物质力量；第五、被告在回到国内之前根据国际安全通行约章应有对所提控诉从事自我辩护的机会；第六、为了强调这种惩罚措施的特殊性质，从而增加这种措施的道德力量，只能按照大会以压倒多数票所同意的危害人类各项罪名提出控诉。

我认为应该扩大国际法院的管辖范围，使它有权在我建议的国际罪犯登记册上增列姓名，而且我也认为除了在我所建议的登记册增列姓名以外并禁止他们从事一切国际旅行或迁移；如果他们从事旅行，有被检举的危险，这就成为一项强有力的制裁办法。

我们知道有些危害人类罪是在南非以外的国家犯下的，而且我们相信有关国家的原告会要求大会让他提起适当的诉讼。但是，我做为南非人，目前主要关心的是已被宣布为危害人类罪的我国种族政策；我代表在我国独有的种族隔离罪行下多年来受苦难的无数同胞，要求有权开展一项程序使那些罪魁祸首成为今后历史上被人类大家庭法庭个别打上烙印的第一批罪犯。让最怕这种登记办法所产生的影响的人先投否决票吧！

以上各种办法能发动有效的道德力量来对付那些把他们自己的白种肤色的价值放在一切人类尊严之上，从而公然侮辱三分之二的人类的人。他们的行径不仅伤害了他们的受害者而且伤害了世界各地人民。正因为他们的逍遥法外产生了在日趋紧张的今日国际关系中最具有分裂性的一个问题，因此，由于大家一致行动以终止对全人类的这种侮辱而产生的国际团结的新意识就会造成一股朝着普遍世界和平迈进的新动力。

主席：理事会有任何成员国要向伍兹先生发问吗？

贾帕尔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我很高兴欢迎你，也很高兴看到你主持这次理事会讨论一个白人社会的无稽行径，这个白人社会的种族主义的态度是属于上个世纪的，是完全脱离了现在这个时代的。

伍兹先生是一个白种南非人，他的发言对理事会特别有意义。我国代表团欢迎他的发言，并认为它有助于联合国对种族隔离所进行的斗争。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四百万的少数白人还能够在经济和政治上几乎无限期统治一千八百万的多数黑人和其他人种，不给他们平等的公民权利。他们是不是有计划地在冒险？假如他们不确信在贸易和商业方面获得一些国家的支持的话，他们难道能够长期维持这种剥削的做法吗？

我要请问伍兹先生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认为对南非的经济制裁行得通吗？有效吗？假如行得通并且有效，那么要多少时间才能对南非政权产生影响？制裁对非洲人民有什么影响？非洲人民是否欢迎制裁？

第二、伍兹先生曾经说，需要大规模的道德力量来打倒种族隔离。当然这在南非是可能的，如果南非黑、白领导人可以在南非对种族隔离自由地组织消极抵抗运动的话。可是我觉得比勒陀利亚政权似乎把所有想法不同的人都监禁起来了，因而剥夺了黑人社会的有效领导。在这种情形下，伍兹先生是否认为应该特别是在欧美各国发动和组织起他所说的道德力量做为各国公众和政府间的群众运动，使他们能集体地使用消极抵抗和不合作的办法来对付比勒陀利亚政权？

虽然我知道伍兹先生发言时曾经对这方面指出过几个可能性，但是我仍然希望伍兹先生对我感到困惑的几个问题予以指点。

伍兹先生：对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是：这种决定的直接影响是心理上的。只要比勒陀利亚政府知道世界各国会因为必需这样做而最后团结起来，那就会对它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

第二、如果有人认为强加全面制裁的措施太严厉而产生不出最终结果，那么还有一套有选择性的、渐进的并附加具体要求的办法，如“某年某月某日要做到这一点，不然就要执行下列的抵制或制裁了”。因此，当我们在此谈到道德力量时，我提议由外在世界产生巨大的心理上的谴责，而关键字眼就是要“团结”。与其

让西方加以牵制，让第三世界和东方要求一件事而西方认为所要求的太过分了，不如从团结一致的行动中产生力量，进而产生出一种心理力量。

第二个问题的答复是：对南非黑人的经济影响极小。我想大家公认，海外投资公司雇用的人数不到百分之二。但是在心理上的影响还是巨大的。我认识的所有黑人领导人——真正的黑人领导人——向来不把问题的经济方面当做一回事，他们说：“我们会照顾我们的人民的。我们宁可选择外在世界的心理谴责，我们能使我们的人民活下去。我们尝过受苦受难的滋味。我们吃得起这一点小苦头。”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主席先生，我要通过你热烈地欢迎伍兹先生的重要发言。我要就伍兹先生没有说到的一点提出问题。

伍兹先生告诉我们西方大国如何协助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继续掌权。长久以来，有人告诉我们说，西方支持比勒陀利亚是为了要遏制共产主义并保护印度洋的重要航线。我的问题是：真是如此吗？还是比勒陀利亚为确保西欧支持它维持种族隔离而作出的低级恫吓？

伍兹先生：答案是：并非如此。其实，适得其反，比勒陀利亚政府的所作所为没有比其他的事更能助长南部非洲的共产主义信仰了。如果西方相信这一点的话，那么就相信了一只纸老虎。

主席：谢谢伍兹先生今天下午给我们提供的情况。

富恩特斯·伊瓦涅先生（玻利维亚）：主席先生，我很荣幸代表玻利维亚代表团祝贺你。你作为尼日利亚外交部长主持了一九七八年第一次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你是新兴非洲的杰出领导人。贵国和我国为了把生活水平提高到一个享有自由的人所应有的尊严和安全标准而携手作战。我们认为你做主席是实现这些崇高理想的好予兆。

今天下午你对我国作为安理会的新成员国说了一些客气的欢迎话，我们很感激。

我们通过你感谢理事会各成员国并保证我国政府会同本组织全力合作努力达成联合国宪章的崇高目标。

最后，我向捷克斯洛伐克、加蓬、科威特的代表致意，并祝愿离任的各国，特别是巴拿马。我们接替巴拿马的席位后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并会尽力推进巴拿马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国时所承担的工作。

主席：谢谢玻利维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午五时散会。